

政治理论与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丛书

Statesmanship

and

Zhi-ti

立国思想家与 治体代兴

任 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宗羲



政治理论与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丛书

Statesmanship

and

Zhi-ti

立国思想家与 治体代兴

任 锋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 / 任锋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5
(政治理论与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丛书)

ISBN 978 - 7 - 5203 - 4422 - 7

I. ①立… II. ①任…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①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498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茵 马明
责任校对 李莉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3
插 页 2
字 数 595 千字
定 价 1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7 年度
“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
专项资金”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政治理论与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杨光斌

副主编 时殷弘 黄嘉树 陈 岳

成 员 (按拼音排序)

陈新明 陈 岳 方长平 黄大慧 黄嘉树

金灿荣 林 红 吕 杰 马得勇 蒲国良

任 锋 时殷弘 宋新宁 王续添 王英津

杨光斌 张广生 周淑真

“政治理论与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丛书”总序

作为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的中国政治学出现于西方思想登陆而中国思想被妖魔化的“转型世代”（1895—1925），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是学习乃至移植的产物。其间，先是学习英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接着是学习苏联，再接着是改革开放以来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总之一直处于学习之中，各种学说、思潮到今天的量化研究方法，都在学习之列。

中国自己有“国学”而无社会科学，学习是必然之路，否则就没有今天的以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科学。与此相对应，中国的“文明型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也是与西方碰撞的产物。在过去100年里，思想引领实践，实践检验思想，也是外来思想与中国实践相互撞击、相互矛盾、相互调试的“长周期”。

客观地说，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作为学科的中国政治学与中国国家建设—政治发展的关系并不那么密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混合型”政治体制、混合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包容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是政治学学科流行的则是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民主与威权等二元对立的否定性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按照流行的政治学理论分析中国政治、中国实践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似乎总是不符合教科书中的“标准答案”。

常识是，一个关乎 13 亿多人口的政治绝对不能迎合任何简单化的理论。要知道，没有任何事情比治理大国更为复杂，这是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同时，基于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特定经验而形成的理论也没有资格去鉴定中国政治发展的对与错，我们只能基于中国经验、在比较研究中形成相应的理论和概念。比较研究的发现是，当西方国家自身陷入困境之中、很多非西方国家也问题重重而导致世界秩序大变革时，中国之路还算顺畅，以至于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替代性模式。

这意味着，中国道路之上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去回答。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20 世纪 50 年代，刚刚诞生的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委员会自信地宣布，基于老欧洲经验的国家、权力等政治学概念该让让位置了。美国人确实搞出了新政治科学，在研究主题上是从现代化研究到民主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是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理性选择主义等的实证主义理论。但是，“实证”（the becoming）的逻辑离“实存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being）越来越远，将个人主义本体论弘扬到极致的美国政治学已经陷于危机之中，中国政治学不能把美国政治学的落点当作我们的起点，不能把美国政治学的败相当作我们的榜样。已经学习美国政治学 40 年的中国政治学，需要有自主性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

自主性政治学的关键是自主性的政治学理论。应该看到，在过去 40 年里，作为政治学理论学科资源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都不尽如人意：政治思想史研究要给中国政治学理论贡献更直接的新知必须拓展其研究路径；历史社会学则不存在“作者群”；而比较政治学一起步就跟随美国比较政治学的“民主转型”研究。这些学科现状决定了建构自主性政治学话语体系任重而道远。

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自主性理论体系。历史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时期提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人民民主国体和民主集中制政体等新政治学概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熟，也是最有力量的“中国学派”，因而解决了中国问题。今天，中国政治学有着特殊的资源禀赋去建设自主性学科体系：第一，和其他学科一样，中国政治学已经足够了解西方政治学，也有足够的包容力去接纳其有益研究成果；第二，和其他学科不同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极为丰富，这是中国自主性政治学建设的最重要的“大传统”和文化基因；第三，有着中国革命经验所形成的“小传统”；第四，有现行民主集中制政体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强大的治理能力和伟大的治理成就；第五，在知识论上，中国政治学直接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一种坚持人民主体性的科学学说，而伴随中国走向世界中心而发展起来的比较政治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的规范性学科来源。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如此独特而又优异的资源禀赋，即使在“历史终结论”如日中天之时，中国政治学阵地也没有丢掉。中国政治学理应倍加珍惜并发扬光大这些优质资源，最终形成自主性中国政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这将是一项值得追求、需要奉献的世代工程。

杨光斌

2018年6月19日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

献给张灏先生
沉思之旅的引路人

目 录

导论 再造家国：治体论与近世秩序的公共性和法度化 (1)

第一篇

第一章 治体论的思想渊源与近世演进：从贾谊到司马光 (45)

第一节 治体论：概念、分期与初期发展 (46)

第二节 近世治体论的实践脉络 (54)

第三节 治体论的基调设定和学统竞争 (67)

第二章 “体乾刚健”：二程经世思维的非常气质 (90)

第一节 立志：三代之道与天理、公论、经筵 (91)

第二节 责任与求贤：共治模式的宪制意义 (99)

第三节 近世儒家变革思维的非常气质 (104)

第三章 “周礼致太平”：李觏的礼治变革论 (112)

第一节 天人相分论和性三品论 (113)

第二节 礼的起源和地位 (118)

第三节 礼治系统中的君主论 (123)

第四节 论辩王霸与富国强兵 (134)

第二篇

第四章 抗衡内转：薛季宣与经制事功学的发轫 (151)

 第一节 薛季宣的经世精神 (152)

 第二节 薛季宣的思想渊源：近世新儒学的胤子 (163)

 第三节 经制之学：儒家政治思维中的道法关系 (177)

 小 结 (223)

第五章 经制事功学的精密化：陈傅良论立国传统中的“恢复” (227)

 第一节 “方今功业，当付儒者” (229)

 第二节 道法之辨：经制之学的政治观 (234)

 第三节 古今之论：政治传统与儒者实践 (244)

 小 结 (251)

第六章 立国思想家的风云际会：吕祖谦与治体思维的二重性 (253)

 第一节 作为立国思想家的吕祖谦儒者群体 (253)

 第二节 “内外相维持”：治体论、理礼关系与人性论 (265)

 第三节 历史观、王霸论与制度变迁 (292)

 第四节 儒者的实践意识 (302)

第七章 唐仲友经制之学的治道与治法 (308)

 第一节 经世传统中的唐仲友：政见与学脉 (308)

 第二节 “帝王为治之要”的治道与治法 (315)

第三篇

第八章 立国规模的本旨与成宪：陈亮论治法和治人 (325)

 第一节 “至公而时行”：法度的价值与历史 (326)

第二节 法史观下的汉宋政治传统及其国本论	(334)
第三节 法度规则与治人的双重主体性	(361)
第四节 治人：朱、陈之辨的德行维度	(369)

第九章 颁定统纪：叶适与治体论的事理思维	(377)
第一节 “欧阳批判”：士大夫政治的反省	(377)
第二节 “经”与“治”：统纪何在？	(387)
第三节 皇极秩序与国本论	(397)
第四节 叶水心治体论中的社会维度与儒法之辨	(413)
第五节 政德论：性分、人职意识与振俗再造	(429)
第六节 反思理学的道德—政治浪漫主义：叶水心 论习性与事理	(444)

第四篇

第十章 从治法到心法：朱子和陆象山的理学治体论	(457)
第一节 朱子的治体论	(458)
第二节 陆象山的治体论	(475)

第十一章 近世治体论的公共理念与实践意识	(485)
第一节 公共理念：理学治体论的治道原理	(485)
第二节 治人主体的实践意识分化	(497)

第五篇

第十二章 吕中与近世治体论的系统化	(519)
第一节 治体论：仁义与纪纲法度的双维	(520)
第二节 制度论：立法、因法与变法	(526)

第三节 制度论：宰相、台谏与经筵	(530)
第四节 纪纲法度的文质虚实之变	(543)
第五节 政治变迁中的纪纲	(547)
第六节 国势论	(551)
第七节 治人：家学和家法中的政学相维	(553)
第十三章 革命与更化：立国时刻的治体重构	(560)
第一节 作为“国本”的立国时刻	(560)
第二节 革命与更化的内在互嵌	(564)
第三节 理解“更化”的两种不同思路	(568)
第四节 更化立国与治体重构	(574)
第十四章 从放逐君主到“以儒立国”	
——《明夷待访录》、“正黄”与现代共和缘起	(579)
第一节 秩序重构中的变革与立国	(582)
第二节 宽猛之辨：治体论视野中的明代立国思维	(595)
第三节 放逐君主与“以儒立国”	(613)
第四节 “正黄”：立国视野中的公共传统与现代共和缘起	(628)
余论	(641)
附录 重温我们的宪制传统	(649)
参考文献	(657)
后记	(675)

导 论

再造家国：治体论与近世秩序的 公共性和法度化

对于近世思想传统的研究，注定难以摆脱现代成见的种种缠绕及束缚，或许这本身就是历史生成与现代性确立的一体两面。而思想漂流的意义，端赖如何使此一过程活力沛然并释放出古、今内在于传统之间的对话可能性。往者尚可追，来者犹能谏，这也是经史之教的古来宗旨吧！

其间，围绕政治活动的诠释，无疑是现代性降临中土之后对传统影响至为剧烈的领域，也由此成为世界文明范围内的互动中心。何谓政治？传统政教礼法秩序的根基逐步坍塌，外埠舶来的诸种主义心智及背后的宗教信念渐渐风行，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精英于此一失衡转型中茂生长成，对现代立国之道的影响既深且巨。

这一进程，在近世政治思想研究即有鲜活展现。为了更均衡把握其间流变和议题，这里大体梳理了两个基本研究进路及居间形态，然后检讨主要问题并阐发牵涉到的理论含义。本文并非对这一广袤研究领域的文献综述，而是致力于对其间具有范式意义之代表作品的检讨。处理对象主要聚焦宋学，部分延伸至明清儒学。一种在传统智慧浇灌下走向强韧成熟的现代政治心智，庶几由此而有再生之机。

一 传统本位的政学溯源

1. 平民化社会的政教重构与思想新声

对于宋明以来政治思想的研究，能够将其置于传统政治社会脉络加以解释、剖析者，可以钱穆先生（1895—1990）为代表。

透过社会政治结构的内在演进来审视立国规模的传统演变，并在这一脉络中解读思想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其历史角色，这是钱穆审视宋明儒与近世思想文化的大着眼处。

从钱穆论史着重的政学传统视野来看，唐宋之际转变下的社会政治结构，尤其是门第与平民之张力，形成宋明儒兴起的宏观背景，而社会自由讲学浪潮下的宋学嬗变是思想文化之主干。

钱穆先生在其通史叙述脉络中，指出中晚唐以后、宋代即近世早期以来，社会文化中心南移，社会阶级隔阂进一步消融，政治权进一步解放。社会政治形态的“平铺散漫”特征越发明显。平民化与门第化两个力量，经历中世世族演变后进一步推动社会结构趋向平等化，即此大势之蕴涵。门第等级一步步削平，社会政治结构中在政府与民众间进行有效联结的组织力量也需要重整。

宋儒兴起，高唱华夷之防和尊王论，这是门第贵族社会退潮、宋朝政制集权后，于理论思想上正式倡导、收拾人心以定于一的一大进展。相对于士族贵族尚佛老、重诗赋文章，新儒家尊儒崇经，推动古文运动。相比唐人重事功，新儒“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唐人的就事论事，转成宋儒的以理待事，“此乃平民学者之精神。彼辈要出来转移世道，而不为世道所转移。虽亦不离事功，却不纯从事功出发”^①。由事入

^①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0—561页。本书所引之文献仅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详细版本信息，再次引用时只交代作品名称和页码。——编者注

理，中国的现代精神也在此处撒播生机。即宋代言事功之学者，与理学家仍共享一套宋学天理观，此其特别精神。现代中国言意义理性、论事功实践，需在此处探求其精神根源。

以义理指导事功、转移世道，且不再受身份门第束缚，平民始得出头，这一历史动力得赖于一种普遍性的精神义理更甚于传统学术。这是近世义理观兴起并盛行的社会政治脉络，包含了意义世界—实践世界的一个范式转移，即从一种新的信仰、教育理想来理解人的群己生活。

从学术传统来看，近世儒家兴起继先秦诸子讲学，开启了中国第二次社会自由讲学的长期演进。宾四先生反复褒奖并称之为“我民族永久之元气”“我民族国家数千年文化正统”^①。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特别将范仲淹与胡瑗视作近世政学精神的肇始，二人分别代表了政治革新与文教重塑的新动向。^②由此以下的宋儒事业，是在精神信念进行更新的基础上，致力于政教秩序重建。这一基本构设支配了宋学及其后续近世思想的发展。

范仲淹、胡瑗的自觉兴起，始见社会民间精神之勃发，渐次展现于庙堂。宋明儒讲学的六百年，政府多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而社会运力活力至显。近世讲学进一步摆脱政治依附，多属社会平民学者自由结合。与先秦诸子投奔诸侯巨室不同，更倾向社会下行。与汉唐儒相比，讲学内容不限于经学家法，更多以各人思想学术为宗旨，讲学方式更显流动性、随机性和公共性。^③

自思想本身看，钱穆指认宋学含有一种近乎宗教的精神气质，“凡内在有一种相互共同的信仰，向外有一种绵历不断的教育，而又有一种极诚挚、极恳切之精神，自发自动以从事于此者，自广义言之，皆可目之为宗教。宋明儒的秀才教，大体以大群全体为归宿，可谓一种‘新儒教’”，“可说是

^① 《国史大纲》，第27—28页。

^② 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 参见《国史大纲》，第798—805页。

范仲淹诸人以来流行于一辈自负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中间的宗教”，“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①。这个新的精神信念形态，致力于成就一个更为高明广大的理想境界，主张此世与超越相通、个体与群体相通、修身与治平相通，打成一片。源自社会民间的自觉精神衍生出一种共识性的信仰，其义理或曰天理观念彰显出近世精神魅力，背后则是一个大公中正以立人极的普遍性最高理念。

“他们热心讲学的目的，固在开发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终目的，则仍在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的世界（开发民智、陶育人才为第一步，改进政治为第二步，创造理想为第三步）。宋明儒理论上的世界，是‘万物与我一体’（张横渠之‘西铭’为其代表作，此即上古先秦相传之一种全体观念也）。”^② 这是我们理解近世儒学大传统精神的关键着眼处。

钱穆将宋学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南渡三大阶段：初期宋学包括宋初三先生、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王安石、刘敞、司马光与苏轼兄弟，中期宋学包括理学系统的北宋五子及其门人弟子，南渡宋学除了理学传承，还有浙东诸儒，及二家汇合产生的后学流裔。^③

此一划分，更多依据义理形态。其中，钱穆对于“经术派”（理想派）与“史学派”（经验务实派）两类不同思想气质的分析，贯穿政治与思想学术竞争，值得重视。司马光为先导的朔学是正统北方派，重史学、实务经验，不信王霸之别，主张延续汉唐法制、祖宗之法而渐进改良。^④ 荆公新

① 《国史大纲》，第 808、793 页。

② 同上书，第 807 页。

③ 参见《宋明理学概述》，第十一、十二、二十节，九州出版社 2011 年版。

④ 参见《国史大纲》，第 589—599 页。另，刘咸炘先生将这种古今经济的经史之别，称作经儒法《王制》与史学术道家之不同，远源在周末的“儒流为法，道流为术”，后者以张方平和苏轼兄弟为代表，尚宽而重势。参见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三册，《宋学别述》之《王氏学述第三》，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56 页。